

#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探析

李学如 陈 勇

**摘要:**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长期的对日外交实践中,他提出了“两个区分”、“关键是要和平共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等指导思想。中日关系遭岸信介破坏后,为修复民间外交并推进向官方外交过渡,他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恢复邦交后,他又及时提出“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官民并举、以官带民”等方针,坚持两条腿走路。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提出及实践,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周恩来; 中日关系; 民间外交思想

**中图分类号:** K8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11)9-244-04

**作者:** 李学如,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陈勇,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44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上海大学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J50106)

“民间外交”,又称国民外交或人民外交,是指国家间非政府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sup>①</sup>从广义上说,它泛指各国人民之间的一切友好往来活动。就狭义而论,它特指那些不代表官方而又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民间往来活动。<sup>②</sup>建国后,中日关系长期处于坚冰状态,为了打破这一僵局,周恩来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外交活动。他本着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的外交思想,在渐进积累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两国关系,最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在国际关系史上创造了新的范例。当今世界,民间交流日益活跃和快捷,“民间外交的作用越来越重要”,<sup>③</sup>学界深入探讨周恩来的对日民间外交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当时美日对华政策的演变、中日两国开展民间交往的现实需要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 美日对华政策阻碍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战后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两国如何结束战争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投降后美国实现了对其单独占领,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都受制于美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成了“美国维持它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地位的关键。”<sup>④</sup>为了把日本变成其远东的反共战略基地,美国迅速地改变了以往的对日政策,加速了对日媾和的进程。1951年9月4日,美国悍然召开了其一手包办的旧金山对日和会,并

于9月8日签订了片面的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对新中国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旧金山和约让日本吉田政府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变得棘手。在选择北京还是台北上,日本政府举棋不定。但在美国看来,“如果日本政府选择北京政权为正统政府,美国远东政策的一角就会崩溃”。<sup>⑤</sup>为此,美国政府不断地向日本政府施压,敦促它加速同台湾当局进行缔约谈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言称“只要日本不承认中华民国,美国国会便无意批准旧金山和约”。<sup>⑥</sup>在美国的重压下,1952年4月28日,日本吉田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日蒋“和约”,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法律障碍。这样,中日之间官方外交在当时难以启动。为了打破僵局,周恩来寄希望通过发展两国民间往来,加深相互理解,使双方保持一个特殊的联系渠道,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创造条件。

## (二) 中日两国开展民间交往的现实需要

战后,中日之间的冰冻局面既与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相左,也于日本人民的切身利益相背离。因此,中日之间冰冻关系的底层仍有着一条民间友好的潜流,这为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

首先,开展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是新中国突破美日封锁孤立政策的现实需要。新中国诞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力图把她扼杀在摇篮里。中国要走向世界,就必须打破西方的封锁。当时,周恩来把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看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因为从当时世界政治形势来看,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直接对话是不可能的。而从日本入手,利用民间渠道,逐步化开坚冰,首先打破自己在亚太地区的被孤立封锁局面,拓宽新中国外交活动空间,这在当时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其次,日本人民也有与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强烈愿望。一方面,战后日本人民渴望和平,希望和中国人民恢复传统友谊。新中国刚成立,日本有识之士就召开了日中友好筹备会。会议通过决议,要把日中友好运动扩展到全国各阶层中去。1950年10月1日,日中友协在其成立宣言中明确表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这种侵略,不仅破坏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破坏了日本人民的生活”。为了完成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的使命,“需要两国人民尤其是日本人民的热情努力”。<sup>⑦</sup>另一方面,当时的日本尚未渡过物质匮乏的阶段,从中国大陆输入工业原料及生活必需品对其恢复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1950年4月29日,日本参议院在一份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中提出“贸易依然不景气,国内萧条日益深化,作为打开这一局面的对策,无论是产业界、贸易界,还是普通国民都强烈要求迅速重开对新中国的直接贸易”。<sup>⑧</sup>日中友协在其活动方针中写

得更明确“战后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已经告诉了国民,没有与中国全面的经济交流,日本的自主重建是不可能的,促进对华贸易已经成了国民的普遍愿望”。<sup>⑨</sup>由此可见,迫切需要和新中国发展经贸往来,成为当时日本朝野和经济界人士的共识。周恩来正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审时度势,抓住了中日关系的联结点,即“中国人民是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日本人民也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这两者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条件”。<sup>⑩</sup>

## 二

自新中国成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一直亲掌握对日工作。期间他进行了广泛的对日民间外交实践,发表了大量关于中日关系的谈话,蕴含着丰富的民间外交思想。

### (一)“两个区分”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但同时也有挥之难去的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痛苦的战争经历。如何消除人民心灵深处的巨大创伤和隔阂,这是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周恩来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精神,强调开展中日关系必须做到“两个区分”,即“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sup>⑪</sup>

早在1952年,周恩来在关于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的声明中就明确指出“吉田反动政府的这种种卑劣行为,是与日本所有爱国人民争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和平关系的愿望绝对违反的。中国人民深知,在美国占领之下的日本以吉田政府为首的反动集团不能代表日本人民。”<sup>⑫</sup>这里,周恩来把日本人民同日本政府加以区别,寄希望于日本人民,预示出两国人民友好的前景。1956年10月,日本在北京举办了商品展览会。这次展览会遇上的大难题是如何解决悬挂国旗的问题。会场悬挂“太阳旗”担心群众情绪上接受不了,但是不让挂旗,从道理和国际信义上讲不通,也不合对等原则。周恩来指示工作人员“要讲政策,多做群众工作”,要“向群众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sup>⑬</sup>“两个区分”思想的提出,增强了我国干部和广大群众从事人民外交的自觉性,同时也打消了日本人士中的某些疑虑,从而为中日双方的民间友好往来奠定了比较牢固的思想基础。

### (二)“关键是要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精髓,也是他大力推行对日民间外交的基础。

首先,民间交往以互不干涉内政为条件。在发展中日关系、争取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周恩来寄希望于两国人民,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干涉日本的内政,并尊重日本人民对其社会制度的选择。周恩来在多个场合向日本友人表达了中国政府的这一一贯立场。

1954年,周恩来在同来访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承认日本人民的日本,日本人民投吉田先生的票,我们就承认吉田先生代表日本,如果日本人民投铃木先生的票,我们也承认铃木先生代表日本。这决定于日本人民的选择,不决定于中国,日本人民投谁的票,谁得的票多,谁组织政府,我们就承认谁”。<sup>⑭</sup>周恩来的这

次谈话加深了日本友人对中国对日政策的理解。

日本战后受美国控制,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地。1956年5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工人代表团时,表达了对日本当时处境的同情。但同时他又强调“摆脱痛苦的办法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不同。中国有中国的办法,日本可能有日本的办法。这要由自己国家和人民来决定,别的国家不能干涉”。<sup>⑮</sup>1957年2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辻政信时进一步表示:“我们并未设想日本会变成社会主义,因为日本人还无此要求。我们很愿与日本友好,尊重日本人选择的制度”。<sup>⑯</sup>周恩来这些谈话,解除了一部分日本人对中国政府支持双方民间往来的戒虑,增强了双方的互信度,从而为中日民间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民间经贸往来要坚持平等互利原则。早在他会见大山郁夫时就说过“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通有无,“这就有利于中日两国贸易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sup>⑰</sup>建国初,新中国提出了工业化目标,这引起了一部分日本人的不安,认为中国工业化会对日本工业化有冲突。针对少数日本人的这种殖民主义心理,周恩来明确指出,“只有中国工业化,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有无相通的贸易关系”。<sup>⑱</sup>因此,“今后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应该真正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sup>⑲</sup>

在中日民间外交的实践中,周恩来倡导和平,真诚地推动两国人民友好相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就表示“中国人民是愿意与日本人民和平相处,友好团结,以保障远东和平的”。<sup>⑳</sup>1954年他在同日本友人谈话时又指出“和平共处,就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共存共荣’”。<sup>㉑</sup>他反复告诫,中日关系的发展前途“关键就是要和平共处,谁也不要存别的心思”。<sup>㉒</sup>

### (三)“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大致萌芽于1952年。据肖向前回忆,在此之前,我国同日本尚无直接接触,1952年“日华和约”签订后,日本人民广泛地开展运动,反对美日政府这种无视现实、违反国际法惯例的做法。不少有识之士试图冲破这种人为的限制,主张同新中国开始实际上的来往,以促进中日关系尽早正常化。在此情况下,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国际活动打开民间接触的途径,并使之扩展为广泛的民间外交。<sup>㉓</sup>

1953年9月,周恩来会见了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这是建国后他会见的第一位日本客人。在谈到如何共同开展中日关系时,周恩来说“我们欢迎日本人民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同时我国人民也愿派代表前往日本访问。”但是现在美、日本反动派阻碍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日本现政府还公然执行着美国政府的“禁运”政策,竭力阻碍中日贸易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因此,“首先打破这个阻碍,需要两国人民的共同奋斗。”<sup>㉔</sup>这里周恩来把发展中日关系的融冰之基寄寓于两国人民,最初表达了发展中日关系必须“民间先行”的思想。

1954年奉行“自主国民外交”的鸠山组阁。鸠山主张改善中日关系,在他任内,双方的民间往来得以不断扩大和深入。

1955年5月,周恩来会见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等人。谈及中日关系时,周恩来说“不但人民要来往,人民还要影响政府,改变政府的态度,两国才能友好”。当然“人民的态度可以影响政府,政府不得不考虑人民的意见,因为它要争取选票”。<sup>⑤</sup>“人民要影响政府,改变政府的态度”,“人民的态度可以影响政府”,周恩来辩证地阐释了“以民促官”发展中日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到1956年6月,中日两国民间团体共签订了涉及议会、渔业、侨民、文化等方面的15个民间协议,创造了民间团体来往的记录。这时周恩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思想也初步形成。他在会见日本国营铁道工会等访华代表团时说,“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需要两国政府的努力,但也需要两国人民的推动。”因为“日本政府在中日建交问题上有困难,困难不仅在内部,而且更大的困难是由于外来的干涉和压力。”那么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呢?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大家为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而努力,也就是帮助日本政府克服外力所加的困难。”他认为,“一个愿意反映民意的政府,一定会懂得如何运用人民的要求来抵抗外来的压力。”基于此,周恩来坦诚地说,在两国政府能够进行直接接触以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东西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些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sup>⑥</sup>

1957年4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时,清晰地规划了民间外交的发展路径。他说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总有一天,日本外交的独立性会更加强,水到渠成,日本撤消对台湾的承认,中日会恢复邦交。”<sup>⑦</sup>7月,周恩来在同日本记者谈中日关系时,高度评价了民间外交的地位和作用。他对记者们说,“我们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在国际关系史上创造了新的范例。我们是抱着这样愉快的有希望的心情来进行国民外交的,我们把国民外交看成是我们整个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⑧</sup>1959年3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时,将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做了精练概括,即“通过人民的努力,推动政府,来达到恢复邦交,缔结和约。”<sup>⑨</sup>这些论述标志着他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思想完全成熟。

#### (四) 对日民间外交政策的调整 “政治三原则”

1958年,通过民间交往而发展起来的中日关系,因岸信介政府的破坏而再陷僵局。

从中日民间交往突然受挫的经验中,周恩来认识到仅强调民间的友好往来和单纯的经济关系而不明确树立政治性原则是不行的。1958年6月11日,中国方面在中国渔业协会通知日方不再延长渔业协定期限之际,提出了恢复关系的三项原则,即:1. 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2. 不制造“两个中国”;3. 不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通常被称为政治三原则。1959年3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时明确了政治三原则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他说:中国方面用各种办法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9年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两国人民团体之间签订的协议和共同声明有几十件之多。但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在敌视中国、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和阴谋制造‘两个中国’的情况下,就无法恢复中日两国

的经济关系”。<sup>⑩</sup>1964年4月,他在会见日本关西经济访华代表团时又说“自从岸信介政府撕毁了贸易协定,我提出了政治三原则,是强调政治的。政治三原则对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日本人民愿意同中国友好,不敌视中国,承认新中国,为恢复中日邦交而努力”,“政治三原则主要是对日本政府说的”。<sup>⑪</sup>

周恩来关于政治三原则的阐释,深刻地剖析了中日关系不正常的责任在于日本政府方面,不在中国和两国人民身上。这样既强调了解决中日关系问题必须从政治问题着手,必须经过政府途径解决,同时又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加以区别对待。从而使日本在50年代末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以促进恢复邦交为主要内容的国民运动,它给日本政府施加了压力,也使中国方面在对日民间外交中赢得了主动。因此,政治三原则并非是对民间外交的否定,而是为民间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向政府外交过渡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 (五) 半官半民的“LT贸易”

从1952年到1958年,中日双方共签订了四次民间贸易协定,这些协定打开了中日之间无官方关系条件下的民间贸易渠道,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为使民间贸易和官方挂钩,周恩来又设想备忘录贸易形式,即由双方有名望并对政府决策有影响的人来担保。

应周恩来邀请,松村谦三先后两次访华,双方达成了通过建立长期综合贸易关系、推动中日关系前进的“君子协定”。在此基础上,1962年11月,中日双方达成《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又称LT贸易)。为保证备忘录条款的实施,中方成立廖承志办事处,日方成立“高崎办事处”(1965年,双方办事处又实现了互派代表、互设联络事务所及交换新闻记者的目标)。从此,在中日民间贸易中除友好贸易外,又建立了备忘录贸易新途径。中日备忘录贸易双方背后都得到了各自政府的支持。中方的官方背景是不言而喻的,廖承志办事处直接受国务院领导,工作班子由外交部、外贸部等政府部门的成员组成。日方的高崎办事处,其成员主要由曾任内阁大臣的政治家和通产省、大藏省的官员及财界人士组成,实际是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通产省外围团体。因此,“LT贸易关系实质是民间形式、官方接触的一种半官半民的关系。”<sup>⑫</sup>

备忘录协定的签订及实施,是周恩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推行对日民间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成果。自60年代初至1972年中日复交,“LT贸易”与“友好贸易”在中日交往中发挥了巨大的桥梁作用。尤其备忘录贸易机构的设立,它不仅直接参与和拓展中日综合贸易,而且为中日双方政界人士的互访、政府间的相互沟通,起到了斡旋、中介和解决难题的“小型使馆”<sup>⑬</sup>的作用,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周恩来对“LT贸易”有很高的评价,称其是“有利于中日两国贸易的发展,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关系的正常化”<sup>⑭</sup>。

#### (六) “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

中日两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共同努力,终于迎来了恢复邦交的美好时日。但在此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不少人认为民间外交完成了历史使命,今后主要是两国政府之间发展官方关系,民间人士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针对这些认识,周恩来及时提出了“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和“官民并举、以官带民”的方针。

1972年7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请他回去跟在野党和友好人士谈一谈,如果中日两国复交了,过去20多年的友好往来会更加密切,更多起来,而不会淡下去。中国人民交了新朋友,是不会丢掉老朋友的。<sup>⑤</sup>1972年8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经济访华团时说,我们要两条腿走路,就象北京的大街上跑汽车也跑自行车一样。既搞政府间贸易,也搞民间贸易;既跟大公司做生意,也跟中小公司做生意;既跟老朋友做买卖,也跟新朋友做买卖。<sup>⑥</sup>1972年9月,小坂善太郎率领自民党访华团到中国,为田中首相访华做准备。周恩来表示,当前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是两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中国人民对于为中日友好播下了种子的日本朋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sup>⑦</sup>

中日恢复邦交后,中日友协根据周恩来的想法,有计划地邀请一些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而尽力的朋友到北京。周恩来抓住时机,亲自做了许多工作。并特别指出,民间外交和官方外交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坚持两条腿走路。民间外交继续发展了,可以使政府外交基础更加牢固;反之官方外交开展了,又可为民间外交提供更为有利的方便条件。<sup>⑧</sup>事实上,中日建交后,在“官民并举、以官带民”方针的指导下,民间外交的面更广、更宽,成绩也更突出了。

### 三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外交理论,它成功地指导了中日正常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同它国的关系提供了经验借鉴。

客观地说,1972年9月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固然同当时的国际形势,中美、日美关系的变化分不开,但是如果没有20几年的中日民间外交的积累,没有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田中首相即便有更大的“决断和实行”的勇气,也难以开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门,中日复交过程会更复杂、更曲折,时间也会更长。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李恩民指出:没有这种持续不断的民间外交,就不能指望中日邦交正常化顺利实现,外交的原动力存在于国民与国民的交流之中,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sup>⑨</sup>事实上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前,中日民间外交的广度和深度是空前的。中日之间的业务协定,除了涉及领海、领空的海运和航空协定之外,几乎都已签署。甚至连中日复交的原则也已在中日之间的备忘录贸易协议中基本提出来了,并在中日友协同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的共同声明中加以公布。正是周恩来倡导并大力推行的民间外交,使中日邦交正常化具备了日益强大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终使两国复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有日本朋友盛赞,是周恩来“亲自启动日中关系的历史车轮”。<sup>⑩</sup>1972年中日建交前,周恩来对日本友人说:我们两国人民之间22年的来往超过了任何国家,这是多年友好的积累,到今天必然会开花结果。<sup>⑪</sup>

中日民间外交的实践还为中国开展同其他未建交国家的关系提供了经验借鉴。我国同马来西亚建交前的“羽毛球外交”,中美解冻前的“乒乓外交”,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意大利、哥伦比亚、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与我建交前,也是民间外交铺的路。这种先打基础、后起大厦的方法,为中国同更多国家建立牢固关系确立了正确的途径。直到今天,在一些暂时仍未与中国建交或复交的国家里,民间外交仍是中国和它们联系的主要渠道。

注:

①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页。

②刘志遥《“民间外交”之我见》,《世界知识》1987年第4期。

③胡锦涛《在对外友协五十周年大会上致词:民间外交越来越重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5月21日。

④[美]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8页。

⑤[日]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笔记》,三省堂1983年版,第60页。

⑥[日]永野信利著、顾汝钰译《日中建交谈判纪实》,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6、76、87、125、273、301、643、150、104、165—166、150、304、313、439、439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田桓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227、227、214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田桓主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80、107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田桓主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91、414、90、146、170—171、417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田桓主编《日本问题汇编》第四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22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田桓主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39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田桓主编《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10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田桓主编《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田桓主编《李宏《理性与艺术外交大师—周恩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

(责任编辑:唐昌福)